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研究^{〔*〕}

○ 刘 慧^{1,2}

-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旅行活动在社会阶级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 内容丰富多彩。与此同时, 旅行交通得到了初步的开辟, 逆旅与客舍也为奔波的旅人们提供了早期的旅途食宿。这些鲜明的特色无疑都深深地打上了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烙印。而且, 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还为后世储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丰富了旅游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旅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先秦时期; 黄河流域; 旅行活动

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居住、生息、繁衍在今天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旅行活动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今黄河中游河南西部的伊洛河平原、黄河下游今河北平原中部。今天黄河上游地区在先秦时期为游牧民族活动地区, 主要表现为部落迁徙活动。而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在先秦时期屡屡决堤改道, 洪水任意泛滥, 也就不可能出现经常性的旅行活动。因此, 笔者所探讨的旅行活动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黄河中游流域。

一、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的主要类型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旅行活动与其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的游踪是跟随部落兼并、部落迁徙、部落狩猎进行的; 进入奴隶社会后,

作者简介: 刘慧(197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与会展学院讲师,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旅游文化、旅游管理。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08JJD840190)的成果。

奴隶主的游乐开始具备了旅游活动的最早雏形,平民百姓也逐渐有了游乐的行为;春秋战国时期,王侯游乐依然是主旋律,但同时也出现了使者奔波往返、士人四处游说的政治旅行、商人熙熙攘攘来往贩运的商旅、平民百姓节日里难得的游娱。

(一) 部落首领、帝王的巡游之旅

巡游是我国古代的统治者暂时离开国都或常驻地到境内领地进行巡视的一种行为,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及经济上的巨大消耗,往往只有社会上的高层统治者才有资格拥有。

1. 部落首领的巡游之旅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舜就曾身体力行,外出巡视江河,治理山川,开拓疆土。他本人有着探幽历险的勇敢精神和睿智学识。据记载:“尧使舜入山川林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巡狩”,亦可写作“巡守”,就是外出巡视所统治疆土的意思。舜的巡狩,可见于《尚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八月,西巡狩,至于四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五岁一巡狩。”^[1]晚年的舜帝还巡狩至南方,探险苍梧大地,终于打通了自黄河中下游通向南方洞庭湖畔的道路,拓展了中原人民的视野。

2. 帝王的巡游之旅

周朝诸多的帝王中,最热衷旅行的当属周穆王,他是西周的第五代国君,史载他“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2],其游踪被详细记录在《穆天子传》中。在这部书里,详细地记述了周穆王西巡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长驱万里,历名山,游绝境,登瑶池与西王母宴饮、诗酒相和,依依惜别的情景,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游记作品。

周穆王的西巡是一次威武雄壮的帝王之旅。在这次旅程中,有被称为“七萃之士”的随从,有天下第一等的驾驭手造父驾驶的八骏马作为旅行交通工具,有地理通伯夭当导游员。旅程的起点是王都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西北),目的地是西王母国土。浩浩荡荡的旅行队伍还带有大批中原出土的精美丝织品和铜器、贝币等礼物。周穆王一路途径犬戎族、曹奴人、剡闾氏、酆韩氏等羌、塞人聚居的地方,目睹了殊方异域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虔诚地祭祀山河,兴致勃勃地行围狩猎,十分愉快地与各民族首领互赠礼物,采集了不少珍奇、玉石、鸟兽,游到了乐而忘归的地步。

(二) 官僚贵族的政治之旅

周王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从政治到文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即所谓的“制礼乐”。按照这种制度的规定,诸侯受封后虽然成为一个地方邦国,但并非完全独立,周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等;诸侯对天子则必须尽朝聘、进贡、出兵役、劳役等义务。礼乐制度的建立,使周王室对各诸侯国有了统一完善的管理,同时也把天子诸侯、外交宾客、莘莘学子、谋臣策士推上了漫漫旅途。

如宾礼,主要由朝见礼、聘问礼、会盟礼构成。朝见礼要求诸侯按照“千里之内岁一见;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岁一见;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岁一见;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岁一见”^[3]的规则朝见周天子。而天子也派使节“闲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胀以教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会以补诸侯之灾。”“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诸侯之间亦须每年互派大夫“相问”,谓之“小聘”,每三年互派国卿“相聘”,谓之“大聘”。朝聘会盟活动极为频繁。届时,诸侯们都要组成朝见行旅队伍,携带珍玩、玉帛、兽皮和奇特产品浩浩荡荡赶往天子都城。于是,周道上年年月月频繁地奔驰着宾礼车马,朝聘者高唱着“皇皇者华,于彼原陈。马先马先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轡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諏”^[4]的旅行之歌。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相争,政局变幻莫测,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为了联络感情,还经常促成政治联姻。这种隔山隔水、长途跋涉的婚旅队伍,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旅行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忧国忧民的士人之旅

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导致宗法制度的解体,文化开始下移,平民阶层与文化知识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早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他们凭借个人的文化修养、知识才能、思想主张来为社会服务,并期望达到“以士求仕”的“以布衣取卿相”的目的。

1. 游学之旅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教育作为曾经被官府、贵族垄断的高雅文化,逐渐开始下移,走向社会,走进私门。大批渴求知识的莘莘学子,不畏艰辛,不辞路遥,争先恐后踏上投师问学的旅途。如孔子从鲁邑曲阜游学周之洛邑,问礼于老子;魏人杨朱游学于老聃,荀卿游学齐稷下学宫;道家的尹文、慎到、环渊、名家田巴也曾千里迢迢游学于齐都稷门外学宫,相互切磋学问,陈述观点,自由辩论;洛阳人苏秦和魏人张仪年轻时也曾离开故土,到陕西拜鬼谷子为师;^[5]韩非和李斯也曾离开自己的国家远赴赵国,向荀况求学帝王之术。^[6]旅行求学的游子们以充满求知欲的心态和文学之士的气质,审视自然山水,领悟人生哲学。章必功先生说:“先秦游学,是最早的民间文化旅行”。^[7]

2. 游说之旅

游说之旅的参与者大都是当时社会中掌握文化知识的士。他们周游列国,以求仕为目的,以布衣结交诸侯为手段,是一种典型的沉浮于宦海的功利旅行。^[8]在周天子权威摇摇欲坠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虎视眈眈,竞相争霸,企图一统天下,各诸侯国出于战争的需要,纷纷招揽人才,为一心求仕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大量的机会,来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9]士人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朝秦暮楚。权贵们盛行“纳贤养士”之风,招募游说的门客,为之出谋划策。诸子百家渴望朝为田家郎,暮登天子堂,竞相研究“治国平天下”

的途径与方法,朝秦暮楚,遍游列国,标榜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企图凭借论辩之术,获得诸侯、私家的赏识,从而达到以布衣取卿相的功利目的。

(四) 利来利往的商人之旅

原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开商旅之先河,为商旅的产生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商部落的畜牧业一直比较发达,商汤七世祖王亥善于管理,精于畜牧,部落的牛羊成群,铺山盖野。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和甲骨《卜辞》记载,王亥与其弟王恒,都曾驱赶大批牛羊去黄河以西,与有易和河伯各部交易。王亥兄弟的“牛羊之旅”开创了商旅的先河,架起了部落沟通的桥梁,扩大了人们的地域地理概念,为随之而来的商业旅行队伍和文化旅行做出了榜样。此后的殷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10],以长途贩运为生。他们赶着奴隶、牲畜、农副品经营四方,最北到达今长城以北 300 公里的辽宁昭乌达盟克什克旗;最东到达今山东海阳等地;最西到达陕西境内的西周发源地;最南已抵达今湖北、湖南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火纷飞,但晋国为了争霸、当盟主,积极推行晋文公的“轻关、易道、通商”政策,放松关卡,修筑道路,允许商人自由出入贸易。甚至,签订盟约,规定不能阻止各国商人贩卖粮食,不能拒绝招待各国商人。使“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天下之旅皆悦而出于其路”^[11],客观上保护和促进了商旅活动的发展。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王对商旅活动的重视,使得“市井”之业,朝野瞩目,“市井”之人,大备于时。^[12] 东方齐国的“文采布帛鱼盐”,南方楚国的皮革、黄金、玳瑁、玉、锡、水果,西方秦国的丹砂、石、铜、铁、竹、木,北方燕国的“鱼盐枣栗之饶”,往来交易,周流天下。他们为了“市贾倍蓰”而奔走四方,也就顾不得“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了。^[13] 商人们走南闯北、东西逐利的行迹,遍布九州大地,编织了旅行通路,增加了先秦旅行文化内涵。

(五) 平民的游乐之旅

夏商周三代,奴隶们当然是无权利享受旅行的乐趣的,但处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自由民却是能够分享山水自然的美与乐的。如《诗经·卫风·考槃》描述了人们对山林的留恋;《诗经·陈风·东门之粉》叙述了陈国那男女在良辰美景中会舞于白榆树下、市井之上的欢乐;《诗经·王风·君子阳阳》在记叙了情人相约出游的无穷乐趣;《诗经·小雅·伐木》则生动叙述了自由民歌舞宴饮的快乐:“伐木于阪。酹酒有衍。笱豆有践,兄弟无远。民之失德,乾糶以愆。有酒胥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人们对乐舞的追求,对田园风光和自然美的关注或凝望,开创了自然景观旅行审美的先河。

二、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的特点

先秦时期,尽管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但人们并没有停止对自然美的追求与欣赏。在早期出现的文化城邦中,游乐活动四季皆有。同时,旅行交通得到了初步的开辟,逆旅与客舍也为奔波的旅人们提供了早期的旅途食宿。这些鲜明的

特色无疑都深深打上了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烙印。

(一) 旅行娱乐以游牧、苑囿游赏、城市游乐为主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在旅行途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来愉悦自己的心情了。比如当时旅行娱乐规模最大的当属游牧,也就是打猎,是一种不以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狩猎活动,因此跟一般的狩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里的《车攻》《吉日》二文所写的就是游牧的内容。游猎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单纯取乐的旅行。

夏商时期的游猎一般在田野中进行,故称“田猎”。从商代后期开始,天子诸侯游猎一般在最早的园林形式——“囿”中进行。“囿”是专门蓄养禽兽的场所,主要供帝王狩猎,也兼作宫廷膳食和贡品的供应地。囿的四周用垣墙圈筑,囿内有天然植物,也有人工种植的树木果蔬,并开凿水池以作灌溉。囿中一般都有土堆筑成的高台,用以登高远眺。台上建屋,称为“榭”,可在此停留观赏风景。正如郑玄所说:“国之有台,所以望气祲、察灾祥、时观游”。^[14]殷商王室对游猎也是乐此不彼,卜辞中有多条记载商王游猎之事。西周特地开辟了游猎场所,如《大雅·灵台》云:“王在灵囿,麋鹿攸伏”,并规定游猎场所的规模:“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并特设“驹虞”的官职,专门负责管理苑囿和游猎诸事。东周的宫廷游猎非常红火,周宣王东巡甫田游猎,“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祖东。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15]展现了射猎的欢乐情景和对此次狩猎的赞扬。像这种形式的游猎在东周时期比较频繁,一年四季不停歇。而且根据季节不同还有不同的命名,如春猎称为“搜”,夏猎称为“苗”,秋猎称为“猕”,冬猎称为“狩”。春秋战国时期,游猎成为宫廷普遍追求的娱乐方式。各国诸侯争行天子“田狩之事,园囿之乐”。如“齐哀公好游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楚襄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帆,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16]千乘的规模,宏大的场面,猎射的车马驰驱之欢,酣畅淋漓。

皇家苑囿不仅是帝王诸侯游猎的场所,还是他们游乐、休憩的主要目的地,这些风景秀美、功能齐全的苑囿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游览审美活动的客体。如夏桀曾大修倾宫、瑶台,“作酒池、肉林”,携妹喜、琬、琰三位美女终日在此游乐。其中酒池大可行舟,常“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17]商纣王建造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又“造倾宫,作琼台,瑶台,饰以美玉”,“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为长夜之欢”。^[18]楚昭王游荆台时,“左洞庭之波,右鼓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19]楚襄王也是“登高必赋”,今日游云梦浦,明日游云梦之台,常常“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20]此外,周灵王筑昆昭之台、齐景公筑路寝台、楚庄王筑层台、楚灵王筑章

华台、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也都是以游乐为主要目的的。他们畅游其间,“恒舞于宫,酣歌于室”^[21],流连忘返。

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娱乐活动也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发展、活跃起来。如齐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22],文艺生活丰富多彩;邯郸还出现了艺妓舞女为富商弹琴、唱歌、跳舞的娱乐项目;新郑虽然城市不大,“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闾闾,有女如菟”,也是“郑声”“郑姬”,声绵绵,舞翩翩,一幅热闹繁华的景象。先秦时代出现在城市里出色的诸姬歌舞、多样的乐器演奏、活泼有趣的游戏互动,显然是有明确消费主体的,他们或是商人、或是学士,也或是平民。这些每日上演于城市当中的娱乐活动,为他们的旅途增添了很多的审美享受。

(二) 旅行交通初步开辟

春秋战国时期,道路平坦宽阔,交通工具日趋完善,管理十分有序。周天子曾设职官司空经常维修道路;去陂障泽潦建造川上桥梁;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作为道路标记;于四郊设置屋庐,储藏食物等等。在这种有效的管理之下,西周在国都洛邑和东都洛阳之间修建了一条平坦宽广的道路,号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路旁的景色也十分美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3]。除陆路交通外,周人还十分注意发展水运交通。魏国西门豹曾领导人民开凿了13条渠道,引漳水灌溉邺下;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又开凿兴修了鸿沟运河。它西起荥阳(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向东流经大梁(今河南开封),再转而向东,流入淮河。沿途流经宋、陈、蔡、曹、卫等国;郑国也修筑了郑国渠,沟通泾水和北洛水,长达150公里;吴国为争霸中原而开凿了邗沟,贯通了黄河、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和长江等水道,形成了纵横交错、南北沟通的经济交流渠道,客观上也为旅行者打开了通途。

交通工具是人们外出时的必备脚力。夏禹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车的制作和使用;商汤时已经驯畜挽车代替人力,“王亥服牛”“相土乘马”就是明证;宗周时期的车已经发展了很多类型,如人挽的辇车、牛拉的舆车、供打仗用的戎车、载客人的路车等等。先秦时期的马车是最常见的旅行交通工具,一般都是双轮、独辕,带有车厢。用两匹马驾驶的车称为“骈”,用三匹马驾驶的称为“骖”,用四匹马驾驶的称为“駟”。车厢上的车盖是活动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拆装,主要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制造一辆车,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多道工序,其部件和马饰多达几十种,不少富贵人家大量使用金玉、彩绸来装饰爱车。如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座车“四牡有骄,朱巾赅纚纚,翟茀以朝”^[24],其制作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马车的大量使用也造就了一批技术精湛的驭手,“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矢,舍矢如破”^[25]“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26],描绘了驭手高超的驾驶技术。

走水路的代步工具是舟。先秦时期黄河流域舟的发展,虽然慢于车,但夏代人的操舟技术已很高明,如《论语·宪问》中就曾赞赏后羿说:“善射,鼻荡舟”;

《竹书纪年》中还曾记述说：“浇伐斟，大战于潍，灭之”。可见，浇当年已将船应用于水战，说明当时人们的操舟技术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殷人的造船技术相当高明，他们已经会注意舟底的弧度，把舟两头翘起，加大舟舱，使舟在行驶中运货增多，速度加快等等；到宗周时，出现了“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的可观局面^[27]。

（三）逆旅与客舍提供了早期的旅途食宿

专门为旅客服务的旅馆的问世大概在夏商周三代，春秋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周文王还曾专门针对旅行者发布诏书《告四方游旅》：“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28]这段话向旅行者交代了便利的旅馆接待情况，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旅行者数目之大，以至于引起政府的重视。

1. 民间旅店

这些旅馆有庶人开的，就在他们紧邻交通要道附近简陋的家或邑，利用农耕之余，为过往、停留的商贾或旅行者提供休憩、食宿服务，最早称之为“逆旅”“客舍”“宿舍”等，是最早的民间旅店。“逆”是迎接的意思，“逆旅”即指迎接旅客的旅店。逆旅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时已出现。据《晋书·潘岳传》云：“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这时的逆旅仅是指提供休息之用而非专门提供食宿为业的旅店。到春秋之后，逆旅开始普遍，不时见诸史籍。《庄子·山木》曰：“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其一人美，其一人恶”；《国语·晋语》载，“阳处父如（入）卫，反（返），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战国时李悝、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私营逆旅业受到严重打击，但由于其对旅行者和开办者双方都有好处，“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私营旅店最终顽强地生存下来。战国时期，由于古代商品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民间旅店在发达的商业和交通的推动下，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部分人从农耕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从事旅馆业务的商人。如与墨子并称“杨墨”的杨朱，在宋国投宿的逆旅就是丈夫为店主，妻妾二人为伙计的民间旅店。^[29]

2. 豪门客舍

豪门贵族因为“招贤纳士”的政治需要，私家出资开办和设置专门招徕门客的旅馆，称之为“客舍”。一般分为三等：上等名叫“代舍”，来此住宿的人，食有鱼，出有车；中等名叫“幸舍”，来此住宿的人，食有鱼，出无车；三等名叫“传舍”，只供应粗茶淡饭，来此住宿的人食无鱼，出无车。

3. 朝廷和侯国的国宾馆

国宾馆有朝廷经营的，也有诸侯经营的，规模、设备和服务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据《国语·周语》记载，当时在国郊及野的道路旁，5公里有庐，备有饮食；15公里有宿，筑有路室；25公里有市，设有诸侯馆，供各国使臣和过客享用；在边境上还有专门的迎宾员——候人，随时招待；王室专门设置司空一职管理国宾馆。《秩官》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敌国宾至，关君以告，行理以节迎之。候人为导，卿出效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空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

虞人入林,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餐,廩人致饩,司马陈皂,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至如归,是故大小莫不怀爱”。^[30]由此可见,当时的宾客进入国宾馆就有人相迎,随之,喂马的、存车的、扫房的、做饭的各司其职,宾客所需的物品,能保证及时供应,显现出有条不紊的经营秩序和高规格的管理制度。

三、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的意义与价值

先秦时期,是旅行活动的萌生时期。此时,发生在经济最发达地区——黄河流域的旅行活动堪称中国旅游的源头,价值珍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旅行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联的。黄河流域领域广大,腹地纵深,回旋天地开阔,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原始踪迹。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生活着大量的原始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新人”们已经拥有了雕刻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细石器,还发明了弓箭和标枪,已经学会使用骨针、骨锥缝制兽皮衣服。此时的人口数量也明显增多,活动地域范围明显加大。群居的“新人”组成一个个部落氏族,逐渐创造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以部族为单位的原始迁徙便开始随之上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落通过迁徙、合并形成部落联盟,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增长、剩余劳动出现、家庭奴隶出现,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日益增多、财产分化和家庭私有进一步滋长、掠夺奴隶与财富战争的频繁,人口的流动范围愈来愈广大,更多的旅人们行走在奔忙的道路上。而此后的夏、商、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经济向上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

此时,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旅行提供了更为稳妥的物质保障,使得先秦时期的旅行大体具备了必要的基本条件,例如有大路、有小道、有车马等交通工具,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货币,有专门的旅馆、逆旅、帐幕来接待旅人,天子巡行还可在诸侯的宗庙和宫室中暂住等等。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期,旅人们的足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史籍中记载的范围,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物质丰富程度,这样的旅程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先秦时代尽管是农业社会,但其小国林立,使者往来穿梭其间;战争频繁,人民颠沛流离,不断迁徙;思想开放,治国学说流派如百花齐开,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文人奔赴各国,激情游说。整个社会交往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许多民众也都萌发了出行的需求。这样一来,经济的发展为旅人们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的发展为旅人们点燃了出行的热情,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旅行活动的快速发展,行色匆匆的旅人们也就越来越多。这一点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能找到例证。例如,《易经》的经文一共有 64 卦,384 爻,其中就有专讲述旅行的“旅”卦。除此之外,在其他卦的卦爻辞中,研究人员还检索出含有旅行方面内容记载的卦有 46 个,占 64 卦的 73%,爻辞 97 条,约占 384 爻的 25%,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出行之频繁,以及人们对旅行活动的重视程度了。

(二) 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为后世储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于深居内陆的农耕民族来说,横亘于大地上的大河巨流是他们难以逾越的天堑,因此先秦时期的人们特别重视对大江大河的征服,为后世总结了成功渡河的经验。例如,《易经》卦九二爻辞中就有“包荒,用冯河,不遐遗”的记载,说的就是利用挖空的大葫芦来渡河的方法。“涣”卦卦辞《彖传》中也有“乘木有功也”的说法,即是利用挖空的树木来渡过江河,通达远方。^[31]

除了旅行技能的经验总结外,先秦时期的旅人们还在长途的旅行生涯中总结了许多提高旅人个人修养,规范旅人个人行为经验教训,此类事例大多集中见于《周易》之“旅”卦。如“旅”卦上九爻记载:“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说的就是旅人因不尊当地礼法,言行不当而被杀的悲惨事件,教导后世旅行者一定要遵守旅行规范,约束自己行为,避免破坏人际关系,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甚至是杀身之祸。此类对旅行者起教导作用的记载在《周易》中非常多见。诸如,“需”卦中有大量词句提醒旅行者要耐心等待,不可盲目冒险,要审时度势,不可轻举妄动;“讼”卦中“同人于野,亨”,教导旅行者切不可自私自利,只有与旅伴和睦相处,同心同德,才能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旅”卦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是告诫旅人在旅途中切不可目光短浅,斤斤计较,或行为猥琐,或骄横不羁,否则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祸患。^[32]

(三) 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丰富了后世旅游文化的内涵

《诗经》“郑风”的《溱洧》堪称我国最古老的一首描写旅行活动的诗。诗中反复描绘咏赞了自然景观的优美、人文群体的热闹、民俗的特色独具,为历代文人墨客传诵至今。诗中的“冶游”一词,受到后世诸多文人的效仿,如乐府《子夜四时歌》中就有“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的诗句,李商隐在《无题诗》中也曾写道:“见我侬羞频照影,不知身属冶游郎”。由此可见,自《溱洧》始创“冶游”,传及后世,“冶游”一词已然成为野游的代名词,成为特指在春天或其他节日里青年男女外出散游的一种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旅游文学作品的内涵。

先秦时期旅行活动的价值,不仅在于用文字记录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还在于通过大量的旅行实践总结了丰富的旅行哲理,对后世的旅游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孔子曾经游历鲁、齐、卫、陈、蔡、楚等多个诸侯国,遍览山川名胜,每到一处问俗、习礼、游学、布道、讲授、歌咏、乐舞,内容十分丰富。在漫长的旅行生涯中,孔子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情操,磨砺了意志,也体验了乐趣。因此,他十分重视旅行的作用,在《论语》中他把旅行视作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把旅行视作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路,甚至把旅行视作积极从政的必由之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是他最著名的旅行总结。在这里,孔子把自然界的山、水与修养、气质、个性品格等人文因素密切相连,他认为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另一方面人也可以从山水游历中得到愉悦与升华。孔子的观点在人们对天地、山川、风雷顶礼膜拜的时代,大胆赋予了人类与自然处于同等地位、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关照的知己力量,引领

旅人们进入了一个人类与山水融合的新的审美境界,把人们的旅行活动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至今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旅游审美情趣。

注释:

- [1][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尚书·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7页。
- [2]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列子·周穆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1页。
- [3][汉]戴德:《大戴礼记》,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331页。
- [4]王秀梅译注:《诗经·小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页。
- [5][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79页。
- [6][汉]司马迁:《史记·韩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46页。
- [7]章必功:《中国旅行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 [8][29]王淑良:《中国旅行史》,北京:旅行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9、45页。
- [9][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页。
- [10][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尚书·酒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6页。
- [11]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公孙丑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2页。
- [12][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24页。
- [13]方勇译注:《墨子·贵义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页。
- [14]王秀梅译注:《诗经·大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7页。
- [15]王秀梅译注:《诗经·小雅·车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2页。
- [16][西汉]刘向:《战国策·楚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30页。
- [17][19][汉]刘向:《古列女传附续列女传·夏桀妹喜》,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38、129页。
- [18][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46页。
- [20][西汉]刘向:《战国策·楚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11页。
- [21]方勇译注:《墨子·非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4页。
- [22][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3页。
- [23][宋]孙奭疏:《诗经·小雅·大东》,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0页。
- [24]王秀梅译注:《诗经·卫风·硕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2页。
- [25]王秀梅译注:《诗经·小雅·车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1页。
- [26]王秀梅译注:《诗经·郑风·大叔于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2页。
- [27]王秀梅译注:《诗经·尔雅·释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9页。
- [28]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 [30]周博琪:《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旅邸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667页。
- [31]黄黎星:《〈周易〉卦爻辞“利涉大川”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4期,第78页。
- [32]孙映逵、杨亦鸣:《“六十四卦”中的人生哲理与谋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59页。

[责任编辑:陶然]